

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

袁鹰：那年八月

索尔仁尼琴的审判

插队四十年纪

共和国第一曲文坛悲歌

李普同志送给我的书

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第一冤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我国向世界交了多少税

谁在谋杀中国人

姚明『弑父杀兄』

第二十一卷

M^悦OK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0

M^{第二十一卷}悦读K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0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 第二十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91-5669-9

I.①悦... II.①褚... III.①书评-选集 IV.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2789号

悦 读 (第二十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5669-9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卷首语



读者看到这一卷《悦读》，就快到二〇一〇年的年底了。在筹划这一卷稿件时，我们原设想请一些作者对本年度出版的新书进行一番梳理。可是，联系了好些作者，最后都未能如愿。一致的看法是，今年的出版物缺少令人瞩目的亮点，平平庸庸的书籍太多了，以至懒以提笔介绍。我们的策划也就付之东流。

其实，二〇一〇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有太多让人捉摸不定的事。从初春起，天气就像脱缰的野马，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暴风雨、强震、严寒、酷暑接踵而至，常使人弄不明白究竟生活在哪个季节。怪异的气候也振荡了经济，弄得地球村的居民都忐忑不安。过去我们好些同胞一直无忧无虑，仿佛自己是生活在“一枝独秀”的土地上，打开电视机，看到的是歌舞升平；走在街头上，到处是洋店名、品牌的广告；欣赏文艺节目，剧中人似乎都不食人间烟火；一个又一个盛会，没有哪个国家可比拟的豪华奢侈场面，令人如痴如醉……然而，到了二〇一〇年的年底，人们不觉惊醒，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着许许多多令人忧虑的问题啊！突袭而来的全国性的“涨风”，使大家坐立不安；上海的那场大火，人们从吞噬亲人生命的浓烟后，渐渐看到了一些不愿看到的東西。连绵数十里自发悼念的人流，一面行进，一面在思索……对现实的关注，会使人们更踏实地一步一步朝前走。

凑巧得很，编完这一卷稿件，发现有多篇与现实有关的文章。有对经济的分析，有对食品、气候、环境等问题的介绍……这些文章，或许没有那些写风花雪月的耐读，也不如奇人逸事吸引人，但他们却以确凿的数据和材料，告诉我们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作为一个读者，应该不断拓展自己的阅读面，除了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文章外，也应多留意平时自己很少涉猎的领域，这才能使自己在纷扰的世界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目 录 Contents

特 稿	那年八月	袁 鹰 / 005
	索尔仁尼琴的审判	李建军 / 015
	技与道	李兆忠 / 023
往 事	插队四十年纪	
	(1970年3月30日—2010年3月30日)	陈 辛 / 033
	离开复旦:一夜间我改变了“成份”	
	——笑谈之一	陈四益 / 041
人 物	共和国第一曲文坛悲歌	
	——身为吴小武的萧也牧	黑 马 / 045
	马寅初的三场演讲	诸荣会 / 053
	一家都是诗人的徐蕴华	蔡登山 / 064
	周扬与丁玲(下)	徐庆全 / 073
怀 念 集	李普同志送给我的书	朱 正 / 082
议论风生	略谈国人的做戏	王培元 / 086
	《春秋》为何特别青睐这个女人?(外二篇)	伊 人 / 090
书与插图	维特与歌德	
	——古典时期的爱情之二	汪家明 / 096

悦读一得

经典新译——读尹宣先生译著《联邦论》

钟志军 / 103

熊彼特：创新的先知？

梁捷 / 105

看摩罗如何理解作家

韩戌 / 107

“老照片”札记

当历史可以被观看……

冯克力 / 110

域外风

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

徐振亚 / 114

一个外国教授眼中的中国学术界

萧文泉 / 124

海外书情

为何要否认莎士比亚？——怎样理解达尔文？——流布全球的核武器——大文豪的不凡生涯——另一种抵抗——历史的见证人——警示气候变化的危险——生不逢时的改革家

/ 129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龄化——我国原生林仅剩六十年前的五十分之一——土地的开发利用无法控制——世界上十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国占了五个——中国大陆基督教近年迅速成长——对我国电影事业是否繁荣的不同看法

/ 138

► 历史往事 ◀

- 第一冤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彭树华 / 141
- 红军高级将领为什么会被错杀 陈胜华 / 155
- 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 秦 铁 口述 / 157

► 国情点滴 ◀

- 第三波移民潮成汹涌之势 如 清 / 159
- 我国向世界交了多少税 宋小宁 蔡宏波 / 162
- 谁在谋杀中国人？
- 有关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些情况 李 波 / 166
- 并非危言耸听
- 全球暖化将给一些城市带来劫难 苏 言 / 172

► 人 物 志 ◀

- 蒋经国迈出国民党改造的第一步 陶 涵 / 178
- 姚明“弑父杀兄” 王 猛 / 183
- “文革”中的曹禺 梁秉堃 / 191

► 四面八方 ◀

- 是谁让蒋介石少活二十年 王 丰 / 195
- 老师的“谎言” 王磊石 等 / 200
- 台湾“养生”热 林瑞珠 / 203

那 年 八 月

◎ 袁 鹰

北京的八月总是燠热的季节。俗话说：“七下八上”，意思是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都是赤日当头的天气。今年八月，高温的日子似乎比往年都长些，天天万里晴空，难见浮云蔽日。过了立秋，仍无凉意。诵宋人词：“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就会想到西风总是要来的，谁也挡不住，再难过的八月，也总是要过去的。

几十年来只有一个八月，一直牢牢地存在记忆里，有时像一只火球，烧得心惊肉跳，片刻不宁；有时如一块坚冰，冻得声息俱停，如同窒息；有时如一柄利剑，刺得神伤心痛，坐卧难安。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那个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结果造成祸国殃民的十年大动乱开始的日子。中年以上的人，不会轻易忘记那个八月。成千上万的人亲身经历那个八月带来家破人亡的创伤

和惨痛而不愿再去回忆，却又不能不去回忆。

——

那年八月，也是炎炎夏日。由两个多月前颁布的《“五一六”通知》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已经点燃起熊熊烈火，烧向神州大地。八月初，一份堂皇庄重的党中央全会决议，宣布所谓“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最高领导人又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明在他领导的司令部之外还有另一个司令部。目标很明确：革命的对象，已经从两三月前那份《“五一六”通知》中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和另一封后来被称作“五七指示”的信中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限扩大，上

自中央党政机关,下到一切基层,尤其是整个知识界。他亲手点燃一个力大无穷的火种,顷刻间烈焰熊熊,燃遍京城,烧向整个神州大地。从此开始了到处是呼叫、到处是惶惑、到处是躁动,也是暴徒们开始逞凶作恶,正直善良的人遭殃受难的日子。

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社位于王府井大街,京城中心,可以最早呼吸到“革命”的空气。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煽动下,开始的一些天,年轻人还是以“破四旧”作为主要内容,最普遍的具体行动是改地名、改校名、改商店名,以“革命组织”名义在王府井大街贴大字报;即日起将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将天安门广场改为“东方红广场”,有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张贴布告,宣布他们的学校已改名为“造反一中”。我们中午休息时上街浏览这些革命宣言,也只是付之一笑,认为青年学生豪气可嘉,行动却未免幼稚可笑。没有料到以后几天传来的消息,就开始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了。

最先听到是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在学校里被“造反”的女学生揪斗毒打致死的消息。卞仲耘和她的丈夫王晶垚抗日战争年代就参加革命,曾是太行山时期《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我们的前辈同事。她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遭到如此毒手?这是八月五日的事,那时候,北京已经有“红卫兵”的组织,打死卞校长,正是学生中“红卫兵”干的事。我们当时惶惑难解:这座学校的学生,许多都是干部子女,不少还是高干子女。他们家庭教育严格,平时想必大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早早就入团入党,即或少数女孩子有些毛病,无非是娇生惯养、爱吃喝打扮,对老师耍耍小脾气之类,何至于用粗话脏话泼在校长身上,甚至毒打致死?她们哪儿来的这股凶劲狠劲?这个疑问,几天后终于有点明白了,她们的代表,在天安门上受到最高领导人接见时,问起姓名,认为“彬彬”二字不好,不能“文质彬彬”应该“要武”。一声令下,千



红卫兵们批斗的场面

万个红卫兵一齐“要武”，争先恐后地“要武”，平时宁静的北京中学校园成了打人的现场，血腥的世界。

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二年后，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去八宝山参加为她举行的追悼会时，从王晶垚兄处得到一些有关她遇难的文字材料，其中最感人的是一封在惨案发生后第三天偷偷写给死者家的隐名信：“……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她死得这样悲惨，这样不明不白，我们坚决要求为她伸冤！”“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意暴露我的笔迹，我希望你相信她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这封极其难得的第一封唁函，给满怀悲痛的家属一线慰藉，多年来我也一直戚然于怀。前些时又读到王友琴女士编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受到更大的震撼，王友琴女士四十多年前曾就读师大女附中，卞仲耘遇害时她是高一学生，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八八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现侨居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她在一九八〇年就留意搜集有关“文革”的资料，穷二十余年之功，走访了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川直到新疆二十五个省、市、区，搜集了六百五十九位受难者的名单，编著成《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上刊登了作者所作《恐怖的“红八月”》长文，可以看作是本书的摘要）。在这本书里，她用两万五千字详细

记叙了卞仲耘的惨死，记下了黑色的八月五日那天学校里发生的事：卞仲耘和学校另外几位负责人，被押往操场跪在台上大会批斗、游街、打扫厕所，不断被责骂，凌辱、毒打……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仍有一些红卫兵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五点多钟时，有人叫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辆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又过些时候，卞仲耘终于被送进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医院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已死亡多时了。”

我读这些文字时，手在颤抖，心在哭泣。但是我不得不忍住悲痛，再抄两段红卫兵贴在卞仲耘家里的大字报：“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分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抄录这些当年可能被“大字报”作者自己认为得意之笔时，我难以止住一阵战栗。这些粗暴、野蛮、无知、下流的语言，怎么会出自一些花季少女之手！是谁将“孩子们一夜都变成了狼”，将她们平时尊敬的老师视同敌人，开口就骂，骂得那么粗野下流，动手就打，打得那么凶狠残暴！

二

红卫兵打死一位中学校长的消息,立刻传遍北京,促发了更多的暴行。其实,在“八五惨案”发生前两天即八月三日,北京大学教授吴光华已经惨遭红卫兵凶手们毒打致死。整个八月,北京的大、中、小学里几乎到处都出现殴打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惨剧。卞仲耘遇难后两天,即八月七日,北京第十女中教师孙彦死于学校中一批号称“十三红”的红卫兵之手。八月二十日,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兼支部书记王庆萍遭到毒打后跳楼自杀。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第三女中校长沙坪被打死在学校厕所里,死的时候,头发都被薅了下来,嘴里塞满污秽物。红卫兵们打死人还不歇手,又将她的尸体放在一间小屋里,强迫押在学校“劳改队”的其他教师们一个个轮流进屋去“摸死人”,作为惩罚。八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教师靳正宇被打死。八月二十七日,人民大学附中教师杨俊被打死……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同卞仲耘有类似处的另一位中学支部书记:北京第八中学的华锦,她很早参加共产党,去世时年仅五十二岁。八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有三所中学的红卫兵联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大会,揪斗三所学校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长,当场打死八中的校长温寒江,华锦被继续关押毒打,三天后,红卫兵宣布她“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但是华

锦的家人和学校其他教师一直都不认可这个结论,十二年后,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作出的《关于华锦同志的昭雪决定》中,有这样的字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锦同志积极参加运动,严守党的纪律,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勇于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严刑拷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凌晨壮烈牺牲……”自称是听从伟大领袖指挥、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却将一位“勇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共产党员迫害毒打致死,使她“壮烈牺牲”。读了这份“昭雪决定”,使人有啼笑皆非、欲哭无泪之感。

野蛮残酷的“红卫兵”,对学校工友,附近居民和退休老教师也不放过。八月十六日,家住东城区东皇城根二十号年已八十岁的居民汪昭钧夫妇被来抄家的二十六中红卫兵打死,同时遭迫害的还有正好从天津回来探亲的女儿。汪昭钧一辈子当海关职员,已退休多年,因为家中子女多,住在一处院里,就被指为房产主,在扫荡之列。他被毒打后同已惨死的妻子女儿一起抬上运尸车时尚未断气,但也一起送去火化场。八月二十七日,十一年前就已退休、住在北京儿子宿舍的六十多岁老教师贺定华,同丈夫姚剑鸣一起被附近的外馆中学红卫兵揪斗。姚剑鸣是“起义人员”,一九四八年参加廖运周为师长的国民党一一〇师在淮海战役中起义,在解放战争

中立了功的。当时造反的红卫兵对这些事都不屑一顾，夫妻俩都被毒打，贺定华当场被打死。姚剑鸣被驱赶出北京，回到安徽老家，两年后仍遭迫害自杀。当贺定华的尸体被抬上卡车送去火葬时，她的女儿站到驾驶室外踏板上，看到母亲衣衫破烂，满头白发被剪得乱七八糟，浑身青紫，颈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痕。她看到带领外馆中学红卫兵来毒打母亲致死的是一个脸型清秀的女学生，从此她一见到有这种脸型的女青年就产生厌恶甚至要呕吐的感觉。我没有机会见到这位遭遇切身难忘惨景的女儿，但我有幸结识她的哥哥姚监复同志，经历了血火炼狱，他已摆脱了父母都在“文革”

中死于非命所带来的悲痛和愤慨，成为一位理性地致力于研究“文革”十年和近三十年历史是非，呼唤民主政治的斗士了。他那位妹妹姚蜀平留学海外，近年来以“文革”为背景写了一部五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悲情大地》，作者在扉页上写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及千百万无辜亡灵——六十年来在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可惜，这样一部好书只能到香港出版。

三

八月二十四日，在我们报社发生了五月十八日邓拓殉难后的第二起自杀。从六



1966年8月起，毛泽东先后接见了来自全国的1100万红卫兵，受接见的红卫兵如痴如狂。

月一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之后，社级领导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已经都被分别戴上“黑帮分子”、“反党分子”、“漏网右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帽子，大楼里满是大字报，也开过几次对吴冷西、胡绩伟等领导人的批斗会，追查他们的“反党罪行”。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正在集中学习，忽然听得人声鼎沸，满楼狂呼，造反派手持名单，逐一到各办公室抓人，集中到五楼礼堂去。我们文艺部原主任、文艺评论家和杂文家陈笑雨（马铁丁），一年前已调去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文革”开始时又被造反派揪回来“交待罪行”。此时也被押到五楼礼堂。十几个人跪在台上，被粗声

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在我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八月也发生一件意外的事。老伴吴芸红当时是一家儿童报纸的负责人,所谓“第一把手”。运动一来,自然成为批斗的对象,给她扣的各种帽子中最大的一顶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让少年儿童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她认为不能在儿童报纸上像成人报纸那样天天登学习毛主席著作文章和“毛主席语录”,便天天挨斗,关在单位检查,不许回家,我还抱着小女儿到她单位去探望过。后来总算可以回家了,却天天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八月的一天晚上,照例挨了批斗回来,吃过晚饭,忽然响起一阵急促敲门声,进来的是单位两位造反派,高声吆喝立刻跟他们走,她来不及问为什么开了一天会晚上还要开,就被推搡下楼。我跟着出去,一直到宿舍门口。宿舍门外停着一辆车,她被推进去,一边一个人将她夹在中间,汽车立即呼啸而去。我木然回家,脑子如同空白,坐定下来,才感到恐怖袭来,在这疯狂的八月,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半夜绑架会将她带到哪儿去呢?思绪如麻中只理出一条:必须打电话去找人。时已半夜,我只好顾不得打扰别人,到传达室拨电话找到她们单位我所熟识的一位友人,告知此事。他说今天晚上并未开会,一再劝慰:“你也不要着急,不会出什么的。”我知道他是好心安慰,我又怎能不着急

呢?回到屋里,心里七上八下,木然枯坐。直至凌晨,她总算由造反派送了回来,一进门就倒在床上。

我第一眼看到她安全回来,身上没有血污伤痕,没有被剃了“阴阳头”,先放下心来。她喝杯水,休息一下,才叙述半夜绑架的经过:她被夹坐在车里,看到并不是去单位的路,渐渐行人稀少,估计已到郊区,却不知是何处,一再问车上人,不予理睬。在一处路口,她忍不住从窗口大声问路上人:“同志,这是哪儿?”却立即被身边造反派喝止:“不许说话!”直到车驶进一座大门,院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估计是西郊某所大学。造反派带她进一间大教室,低着头站在讲台前,满屋吵吵嚷嚷的学生喊着口号,要她交代当年读大学时地下党的组织领导的情况,她回答:读大学时虽已入党,但组织关系不在学校,因此不知道学校里党员情况,无法回答。在一阵“不许狡辩”之类的责骂后,只好送她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直是个谜。直到四五年后,有一位大学老同学来访时送了一瓶虎骨



“文革”中一个正在受红卫兵折磨凌辱的人

酒,才猜想到可能是她在那所大学里担任领导职务,造反派追查她的历史,想从她的老同学处发现什么问题。却没有料到绑架毫无所获。这类事在那个疯狂血腥的八月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对芸红心灵的创伤是很重的,她如今已是耄耋高龄,记忆力大大减退,但是说起“半夜绑架”,仍然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对当时全北京人不寒而栗的红卫兵暴行,《文革受难者》的编著者王友琴有一段概括说得很对:“红卫兵暴行,并非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行和政府暴行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就是说,在施暴者的心中,既丧失了理性,也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标准,更不用说遵纪守法的观念,剩下的只是兽性。”那么,究竟谁将他们和她们从善良的青年变成暴徒?谁应该对毒害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灵魂负罪责?

四

“文革”结束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六月,巴金老人就呼吁成立“文革”博物馆。老人说得很清楚:

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该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

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十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会不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现在距巴金老人发出呼吁又已过了二十五年,重读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仍然会引起心灵的悸动。老人理想中的“文革”博物馆仍然只是善良的愿望。二十五年来,北京和外地盖了难以数计富丽豪华的楼堂馆所、别墅豪宅,近些年来又兴起修建真真假假的“文化古迹”、“名人遗址”以及尚不明真伪的“古墓”,争先恐后去“申遗”,去开发旅游点,不惜耗去大把大把的银子,却从未有人去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少数民间人士自办的小型博物馆,以搜集和收藏“文革”文物为主,规模和影响都还不小,然而,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博物馆”,即用文字记录亲身经历的那罪恶十年的各类著作,这十几年来仍然出现了许多,现在还不断问世,尽管受到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阻挠,却受到千万读者的欢迎。如今又出现了这本具有血泪实录意义的《文革受难者》,六十二万字,每一页都是一笔血泪债,每个名字都纪录一个生命被毁灭。可以说,这本书是文字的“文革”博物馆最珍贵的展品之一。巴金老人的话,拷问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想想每



1966年8月，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张
贴出大量大字报

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那些亲手毒打致人死命的人，他们能心安理得若无其事地度过这几十年岁月吗？

《炎黄春秋》二〇一〇年第八期上，读到原师大女附中几位学生的谈话记录，编者用了《卞仲耘之死另一种陈述》作标题。我仔细读了两遍，百感交集。时隔四十多年之后，那几位原师大女附中学生总算都承认了卞仲耘老师之死和其他几位老师受到毒打和凌辱的“血写的现实”，都说了“我真后悔死了，没有果断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为”、“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这样的话，当时曾受到最高领导人接见至今还被学校引以为无上光荣的红卫兵负责人，也总算抛弃了御封的改名而恢复了原名。她们“陈述”八月五日那

天发生的血淋淋的惨案时，用“八五事件”这纯客观的分量很轻的四个字，总使人感到这几位当事人（其中还有当时的负责人）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些什么，回避些什么。其实，这又有什么用呢？

季羨林老人在上世纪末写了一本《牛棚杂忆》，详细记录了他和北京大学教授学者们十年中的遭遇。在自序中，老人恳切地期待经过十年灾难的领导人、老将军、知识分子、作家动笔或者口述自己的经历，为国家民族留正史无前例、旷世难有的历史。他也同样恳切地对“文革”中“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造反派’”提出希望：“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站出来表露一下或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居要津。即使别

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说为我们的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老人的真诚期望也是许多人的期望,这些年来,前一类的书籍和文章确实已经见到不少,还会越来越多,尽管受到不同方式的阻挠,还是能到千万读者手里。后一类则很少见,《炎黄春秋》发表的虽是“另一种陈述”,引起读者广泛的注意。在此之前,《炎黄春秋》近年已经刊登过几篇个别作者的回忆和忏悔,读了都令人感

动。真实是历史的灵魂,有如滔滔洪流中一座巍然屹立的岩石,时光流转,水落石出,愈久愈清晰,任谁也无法凭借权力、地位或者别的什么伎俩,都无法改变它一丝一毫。

那年八月,那个血腥的黑色的八月,虽然只是一个,三十一,连同那十年中每个日日夜夜,将会永久地凝固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它以血淋淋的大字昭示后人:没有政治民主和体制监督严格约束,而容许个人独裁专行、号令天下;没有依法治国切实执行宪法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容许少数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就难以保证十年浩劫不会以新的形式重演,真到那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难免不沦于万劫不复的惨境。时至今日,难道真还有人愿意看到那旷世大悲剧重演吗?

2010年10月底

补白

朱德的兰花

朱德总司令非常喜欢兰花,收集了六百多盆兰花。这些花有时作为会议场所的摆设,有的放在中南海的一个凉棚中,供人欣赏。没多久,毛泽东发话了,他对警卫局的汪东兴说:“把颐年堂的花盆都撤掉,我家里什么花都不要。开会、办公的地方,就是开会、办公嘛!我们不学封建士大夫提笼架鸟,摆花赏花那一套。”朱德知道毛主席的批评意见后,立刻通知行政处将六百多盆兰花全部送往各公园,供游人参观,自己一盆也不留。别看朱德比毛泽东高出八岁,比陈云大十八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是个老大哥。但他处处像个顺从听话的“小弟弟”。